

陈独秀科学思想的主要内容与影响

孙小金

(同济大学哲学社会学系,上海 200434)

摘 要 陈独秀是五四时期反传统的猛士。陈独秀认为,五千年来的中国文化,本质上是畸形的文化。既然民主和科学能把西方引到高度文明发达的社会,那么,也一定能帮助中国达到这一目标。因此他高举科学与民主的旗帜,他把科学视为理想的知识形态,把科学当作反对蒙昧主义的锐利武器,主张以科学改造中国社会。他的科学思想在中国起到了开启民智,重立人心的积极作用。

关键词 陈独秀 科学思想 积极作用

中图分类号:D6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4970(2005)02-0045-04

陈独秀(1879~1942),生于安徽怀宁县。18岁时放弃科举考试,放弃对中国古代经典的学习,转而学习康有为、梁启超的著作。同年陈独秀有感于甲午战争的惨败,欲为发展海军效力,于是写成《扬子江形势略论》。文章才华横溢,爱国之情溢于言表。他从此名扬四方,被称为“皖城名士”。

1900年到1915年间,他先后4次东渡日本留学。在日本,他接触到人权学说、社会达尔文主义等思潮,并且积极从事反清活动。1902年,他在安庆组织“青年励志学社”,首先提出了“科学与民主”的口号。1904年到1905年,陈独秀在安徽芜湖创办《安徽俗话报》,宣传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思想。他认为,由于国民愚昧,缺乏关于民主和科学的起码知识,因而造成了辛亥革命的失败,为了开启民智、唤起国民的觉悟,他1915年6月到上海创办了《青年杂志》,1916年《青年杂志》更名为《新青年》,拉开新文化运动的序幕。陈独秀富于创建性和思想性的时期在1921年之前。在这段时间里,他著述甚多,涉及文学、历史、哲学、政治、文字学等学科,约150万字。

一、陈独秀科学思想的缘起

陈独秀的思想,源自当时的社会历史环境。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凭借“坚船利炮”撞开中国的大门,迫使古老的“天朝大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在这一时期,中国人民在政治、军事、外交、文化等领域想尽种种办法抵抗列强,结果却是冷酷无情的失败。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都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正是在多次失败

的过程中,先进的中国人不断总结经验教训,逐步认识到失败的根本原因来自中西文化的差异,而中西冲突的实质是两种不同文化的冲突。正如梁启超在《五十年中国进化论》中说,近50年来,中国人渐渐知道自己的不足了,第一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第三期便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在文化反思过程中,中国人开始检讨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缺陷,试图引进来自西方的新理论和新哲学对其加以改造。那么,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支柱的儒家文化首当其冲地成为反思和考察的对象,同时也成为中国积贫积弱局面的责任承担者。

随着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对比的深入,儒家文化的危机日渐凸显,中国不可避免地进入了思想文化转型时代。从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新思潮不断涌现,“重估一切价值”的时代到来了。正如闻一多所说“我们这时代是一个事事以翻脸不认古人为标准的时代。”以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吴虞等人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提出科学、民主与自由、人权的口号,猛烈批判旧纲常旧名教,认为中西文化如同水火之不能相容,只有打倒孔子偶像,才能建立新文化。

陈独秀对传统文化有很形象的描述。1913年4月25日的《民国日报》“觉悟”副刊刊登了他的《评泰戈尔在杭州上海的演说》。文章中说,中国文化到底是些什么,说起来实在令人可笑而且可怕。这种可笑可怕的文化倘不被物质所迫,皇帝仍在坐龙廷,龙廷里还幽闭着许多宫妃与阉宦,男子仍在埋头读八股,女人仍旧裹着足关在绣房里,印刷店仍用雕版或木质

活字,不会有现在的商务印书馆图书馆欢迎泰戈尔;泰戈尔坐小车由杭州到北京,至少要走一个月,泰戈尔路上犯了法,知县大老爷或许赏他数百小板、一面大枷。——像这样的文化,不但没有维护的必要,还应设法令它速死。传统文化在陈独秀看来,就是皇帝、宫廷、宫妃、阉宦、八股、裹足、小板和大枷。

五四时期的反传统,是针对时人所认定的中国文化的问题进行的。陈独秀称,五千年来的中国文化,本质上是畸形的文化。传统社会的知识分子,貌似博学多才,忧国忧民,实则既不能真正体察民意,又对科学一窍不通,而只能投身专制朝廷充当政治工具。陈独秀概括中国社会是农不知科学、工不知科学、商不知科学、医不知科学的社会。作为传统文化基本指导思想的孔孟儒学,更被“五四”主将视同寇仇:孔二先生的礼教讲到极点,就非杀人吃人不成功,真是惨酷了!一部历史里面,讲道德说仁义的人,时机一到,他就直接间接地都会吃起人肉来了。^[1]固有之伦理、法律、学术、礼俗,无一非封建制度之遗……尊重二十四朝之历史性,而不作改进之图,则驱吾民于二十世纪之世界以外,纳之奴隶牛马黑暗沟中而已,复何说哉?于此而言保守,诚不知为何项制度文物,可以适生存于今世。吾宁忍过去国粹之消亡,而不忍现在将来之民族,不适世界之生存而归消灭也。^[1]

正是对传统文化的这些认识,促使陈独秀大张旗鼓地倡导反传统思想。陈独秀说过:“吾辈少时,读八股,讲旧学,每疾视士大夫习欧文谈新学者,以为皆洋奴,名教所不容也;前读康先生及其徒梁任公之文章,始恍然于域外之政教学术,粲然可观,茅塞顿开,觉昨非而今是。”^[1]五四开始时期,陈独秀对孔孟之道、东方文化、国学国粹国故就施以猛烈攻击,一直将之认定为国之妖孽,认定是麻痹、蛊惑中国人的精神鸦片,是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主要障碍,是中国封建文化和反动势力的保护伞。1915年11月15日,陈独秀《答李大槐》的公开信,第一次比较明确地把礼教与孔子联系在一起。但对礼教更有力地批判,还是一个半月后发表的《东西民族根本之差异》。这后一篇文章的出现,是陈独秀思想上的一次飞跃。此时,陈独秀突破了直觉的倾向,开始比较理性地批判礼教。

到了五四时期,陈独秀举起科学和民主的旗帜,把新文化运动推向高潮,大张旗鼓地反对孔教,反对旧道德,反对旧文学旧艺术。他认定的发展逻辑是:既然民主和科学能把西方引到高度文明发达的社会,那么,也一定能帮助中国达到这一目标。基于这种判断,他曾把西化视为挽救中国民族危亡的必由

之路。他坚信:“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来,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2]民主和科学成为向西方学习的突破口,也成为改变中国社会的突破口。

二、陈独秀科学思想的主要内容

20世纪初,来自西方的近代科学首先得到先进知识分子的认可,进而形成了更加广泛的社会影响。陈独秀就是当时倡导科学和民主的旗手。陈独秀认为,不懂科学是中国文化落后的主要原因之一。他在《新青年》第一卷第一号中发表《敬告青年》,文中写道:“士不知科学,故袭阴阳家符瑞五行之说,惑世诬民……农不知科学,故无择种去虫术。工不知科学,故货弃于地。战斗生事之所需,一一仰给于异国。商不知科学,故惟识罔取近利……医不知科学,既不解人身之构造,复不事药性之分析。……凡此无常识之思维,无理由之信仰,欲根治之,厥维科学。”^[2]由于中国在科学方面落后,导致中国在学术、农业、工业、商业、医疗、军事等方面都处于落后状态,而要改变方方面面的状况,只有从振兴科学着手。在这里,陈独秀把科学当作救亡图存的根本大计,率先提出科学兴国的主张。

但是在陈独秀的眼里,科学主要不是指自然科学知识,而是一种对科学的信念。陈独秀当然希望中国拥有作为工具理性的自然科学,但是更倡导人们对于科学的信念,倡导人们接纳科学,相信科学,把科学作为优于传统的文化来对待,同时也把科学视为传统文化的出路。因此,陈独秀的科学思想,是哲学意义上的文化思想,而不是科技意义上的科学思想。他说:“科学者何?吾人对于事物之概念,综合客观知识现象,诉之主观之理性而不矛盾之谓也。”^[2]他认为科学作为一种知识体系来说,乃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客观事物是认识对象,主观理性是认识主体。在这里,他一方面把科学同唯物主义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把科学同理性主义联系在一起。这完全是一种异于传统的全新文化思想。他关于科学的认识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强调科学是一种价值信仰体系,主张“以科学代宗教”。陈独秀受实证哲学的影响,把科学提到价值信仰的高度,认为科学不仅仅是一种知识体系,更重要的还是一种价值信仰体系。科学经过长足发展以后,完全可以取代宗教的位置,主宰人们的精神生活。他说:“宇宙间物质的生存与活动之外,世人多信有神灵为之主宰,此宗教之所以成立至今不

坏也,然据天文学家之研究,诸星之相毁,相成,相维,相拒,皆有一定之因果法则。据地质学家之研究,地球之成立,发达,其次等井然,悉可以科学法则说明之。据生物学者,人类学者之研究,一切动物,由最下级单细胞动物,以至最高级有脑神经之人类,其间进化之迹,历历可考。各级身体组织繁简不同,势力便因之而异。此森罗万象地,果有神灵为之主宰,则成毁任意,何故迟之日久,一无逃于科学的法则耶?有神话者其有以语我!^[2]他把科学当作唯一可靠的价值信仰体系,认为科学不仅可以取代宗教,而且还可以取代中国的价值观念,声称“要维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吾人尚论学术,必守三戒:一曰勿尊圣。尊圣者以为群言必折中于圣人。而圣人岂耶教所谓全知全能之上帝乎?二曰勿尊古。尊古者以为不师古,则卑无足取。岂知古人亦无所师乎?……三曰勿尊国……此种国粹论,以之励进民德而不足,杜塞民智而有余。^[2]陈独秀将尊古崇圣当作中国落后的原因,主张用科学主义观点评判传统文化的价值,这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流。

他从不怀疑科学开拓知识领域、揭示宇宙秘密的能力,把科学当作反对蒙昧主义的锐利武器。他说:“余主张以科学代宗教,开拓吾人真实之信仰,虽缓终达,若迷信宗教以求解脱,直欲速不达而已。^[2]他反对迷信和所有形式的崇拜。“凡是无用而受人尊重的,都是废物,都算是偶像,都应该破坏……这种偶像倘不破坏,人间永远只有自己骗自己的迷信,没有真实合理的信仰……天地间鬼神的存在,倘不能确实证明,一切宗教,都是一种骗人的偶像;阿弥陀佛是骗人的,耶和華上帝也是骗人的,玉皇大帝也是骗人的,一切宗教家所尊重和崇拜的神佛仙鬼,都是无用的骗人的偶像,都应该破坏!^[2]谓宇宙人生之秘密,非科学所可解,决疑释忧,厥惟宗教。余则谓科学之进步,前途尚远。吾人未可以今日之科学自画,谓为终难决疑。反之,宗教之能使人解脱者,余则以为必先自欺,始可自解,非真解也。真能决疑,厥惟科学。故余主张以科学代宗教^[1]。”“今欲学术兴,真理明,归纳论理之术,科学实证之法,其必代圣教而兴欤!^[12]陈独秀认为,科学将把“宗教”、“圣教”统统驱逐出人们的精神领域。就他反对蒙昧主义这点来说,他的主张具有历史的合理性,在当时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但他把科学当成了价值信仰合理性的唯一根据,流露出确立科学在精神领域中的霸权地位的意向。

第二,强调科学是现代化的标志,主张以科学为

武器改造中国社会。陈独秀把西方发达国家看成实现现代化的范例,并认为现代化有两个明显的标志,一个是民主,另一个就是科学。他将二者比作车之两轮:“近代欧洲之所以优于他族,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之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2]他把科学视为社会进步的必要条件:“我们相信尊重自然科学、实验科学,破除迷信妄想,是我们现在社会进化的必要条件。^[2]因此,中国要想赶上西方发达国家、实现现代化,就必须尊重科学、传播科学、发展科学。陈独秀把科学视为改造中国社会的武器,希望科学在中国发挥其巨大作用,主张用科学与民主救中国。他说:“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迟。^[2]在20世纪初,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只有西方发达国家,在这种情况下,陈独秀不可能划清现代化与西化之间的界限,因此我们大可不必指责陈独秀把现代化与西化等同起来。出于对现代化的向往,出于挽救民族危亡的紧迫感,陈独秀大力倡导科学,对于中国社会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这是应当肯定的。

第三,强调科学具有普遍的有效性,把科学视为理想的知识形态。陈独秀的科学观念,不仅仅限于自然科学,而且还包括社会科学。他的兴趣不在于探讨科学本身,而是要以科学为武器,立足现实、改造现实。他在《答曾平》一文中说:“我们对于学术思想的责任,只应该把人事物质一样一样地分析出不可动摇的事实来,我以为这就是科学,也可以说是哲学,若离开人事物质的分析而空谈什么形而上学的哲学,想用这种玄杳的速成法来解决什么宇宙人生问题,简直是过去的迷梦,我们快醒了!试问人事物质而外,还有什么宇宙人生?^[2]他把自然科学当成理想的知识形态,主张以自然科学为规范来建立社会科学体系。在他看来,社会科学只是自然科学在社会领域的延伸:“社会科学是拿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用在一切社会人事的学问上,象社会学、伦理学、历史学、法律学、经济学等,凡用自然科学方法来研究、说明的,都算是科学,这乃是科学最大的效用。^[3]陈独秀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仍未放弃这种信念,按照他的理解:“欧洲近代以来自然科学证实归纳法,马克思就以自然科学的归纳法应用于社会科学。……马克思所说的经济学或社会学,都是以这种科学归纳法作根据,所以都可相信的,都有根据的。^[4]他把唯物史观理解为“科学的人生观”。在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他批评玄学派的自由意志论,批评科学派没有抓住科学人生观的实质,明确地表示:

“我们相信只有客观的物质原因可以变动社会,可以解释历史,可以支配人生观,这便是‘唯物的历史观’。^[1]

陈独秀的科学思想,在他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是同进化的唯物主义结合在一起的,而在他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又同唯物史观结合在一起,前后没有发生多大变化。由于陈独秀同时具有新文化运动发起人和中国共产党创立者的双重身份,因而他的科学思想影响非常大。正如杨国荣在《科学的形上之维》一书中所述:“在科学被赋予至上价值的背景下,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似乎也受到了科学主义思潮的某种影响,从陈独秀以科学代宗教、邓中夏以科学代哲学、到郭沫若等以科学方法治史,等等,都表现了这一点。‘科学的’常常成为‘正确的’的代名词,这种观念后来往往也渗入到了具体的实践过程,其中包含多重历史意蕴。^[5]有相当一批知识分子把科学当成摧毁传统价值观念的工具,当成更新知识、除旧布新的理论依据,当成勾勒未来理想社会蓝图的主色调。胡适当时曾说,现在有一个词,无论是不是懂它的意思,没有一个人敢反对它,这个词就是科学。总之,他们把科学当作一种最好的东西,当作万能的灵丹妙药,把科学方法作为寻求真理和知识的唯一方法来接受、来宣扬。随着科学观念的普及,科学在五卅时期直接上升为一种‘主义’,成为当时的理论支点,并且渗透到学术和政治及社会生活的各

(上接第 37 页)加强修养。共产党员加强修养,绝不仅仅是关系到个人品德和素质的问题,而且直接关系到党的整体形象和整体战斗力,乃至关系到党的事业的兴衰成败。其二,有利于我们进一步强化意识。党的执政能力越来越成为推进党领导的伟大事业、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完成党的执政使命的关键因素。^[4]我们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领导核心地位以及我们党在新世纪新阶段肩负的重任和使命,都决定了必须始终把执政能力建设作为一项根本建设来抓,这也是保持党的先进性的题中应有之义。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强调,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以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队伍建设为基础,努力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正是执政党建设的时代要求和伟大创举。我们要从全局和战略高度,充分认识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重大意义,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中央的重大决策和部署上来。其三,有利于我们进一步坚定信念。共产党员带头贯彻执行党在现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也就是以实际行动坚持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其四,有利于我们进一步刻苦学

个领域。此时,科学已经超出了实证研究的范围,成为价值和信仰的基础,成为摧毁传统价值观念的工具,此时的科学不再局限于科技意义的科学本身,而是成为一种新的文化思潮。科学作为崭新的知识成为除旧布新的理论依据,成为未来社会的基石。科学被毫不置疑地作为一种最好的东西,并把科学方法作为寻求真理和知识的唯一方法来接受。事实上,科学在当时已成为古代教条的终结者,科学被尊为一切判断的最终裁定人。但是另一方面,尽管科学精神与科学方法受到极端的崇拜,但在科学观念的支配下,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机制却被忽视,科学仅仅成为一种口号而被信奉,几乎成为支配所有观念的依据。科学主义虽然影响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但并不直接有益于科学的发展。所以在中国现实历史中,虽然科学主义风行几十年,但并未促使科学本身的同步发展。

参考文献:

[1] 陈独秀. 独秀文存[M]. 合肥: 安徽人民出版社, 1987. 80, 145, 137, 166, 345.
[2] 陈独秀. 陈独秀文章选编[M]. 北京: 三联书店, 1984. 243, 9, 9, 551, 545, 91, 145, 155, 9, 245, 361, 820.
[3] 陈独秀. 新文化运动是什么[J]. 新青年, 1920. 7(5).
[4] 陈独秀. 马克思的两大精神[N]. 广东群报, 1922-05-23.
[5] 杨国荣. 科学的形上之维[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19.

习。共产党员要保持先进性,就必须首先从加强自身学习着手。只有理论功底深厚,知识丰富渊博,才能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保持共产党人的先进性,也才能真正承担起历史的重任。其五,有利于我们进一步发展党内民主。党内民主的健康发展,有利于解决各级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自身存在的问题,有利于提高自我净化和自我完善的能力。在增强能力上体现民意,集中民智,激发民力,能最大限度地调动多数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最大限度地提高各级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的整体能力,从而保持共产党人的先进性。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 邓小平文选(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4. 218, 221.
[2]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 邓小平文选(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4. 276, 141, 143, 233, 331, 222.
[3]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 邓小平文选(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 28, 104, 291, 272, 144.
[4] 宗岩. 执政能力建设是党执政后的一项根本建设[N]. 人民日报, 2004-10-14(9).